

收稿日期:2020-11-02

《简·爱》中的窗意象及其价值探微

陈思宇,傅守祥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窗,因其特殊属性成为文学作品中重要的意象符号,并在文学语境中被赋予多种解读。夏洛蒂·勃朗特在小说《简·爱》中尤其致力于窗意象的构建,窗意象出现频繁且意味深长。借鉴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中的相关理论,从倚窗庇护的原初性、透窗探看的开放性、受窗护佑的安全性以及借“窗”栖居的独立性四个层面,探究有形之窗对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的文学价值与无形之窗对于简·爱、夏洛蒂·勃朗特及其同时代女性所具有的独特心理与文化价值。窗,既是家宅建筑的一部分,又是简·爱精神世界的物象体现;小说既展现了简·爱在家宅与社会中可依赖的“世界的一角”,也见证了以夏洛蒂·勃朗特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努力创作求得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

关键词:窗意象;女性意识;女性小说;《简·爱》;夏洛蒂·勃朗特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2-0064-07

作者简介:陈思宇(1997—),女,江苏盐城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傅守祥(1970—),男,山东东营人,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2.022

著名学者、作家钱锺书曾以“窗”来比喻生活、思考人生,在他看来,窗既象征着开放接纳、沟通自然,又意味着占有享受、启悟心灵,启示人们回归自我、审视人生^[1]。文学中的“窗”既开放又内隐,这一特性使其作为文学意象常常充满了审美趣味与神秘气息。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文学经典中的窗意象研究较多,如王书艳的《唐诗“窗”意象的空间审美与文化意蕴》^[2]、姚琨的《“窗”内的悲剧——论〈雷雨〉中窗户在创作中的作用》^[3]、宋新宇的《〈红楼梦〉中窗的文学功能研究综述》^[4]等;而对外国文学经典中窗意象的探讨相对较少,且多是从中外文化比较的视角来解读作品中的窗意象。

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的小说《简·爱》自1847年问世,因其精巧的构思、波澜起伏的情节、诗意的对话等,至今仍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细读小说文本,其中的窗意象密集且意味深长,结合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中的相关理论,或许可以通过分析窗意象揭示出“窗”对于夏洛蒂·勃朗特及其同时代女性所具有的独特心理与

文化价值。巴什拉认为,从现象学角度研究内部空间的内心价值,家宅是最合适的研究对象^{[5]1}。人们在家宅的现实与虚拟之中,通过思考和想象来体验让人感觉得到庇护的特定空间^{[5]4}。因此,应该超越描述家宅的层面,而从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这三种重要性递减的角度,感受人们对于家宅的原初依恋,分析人们对特定空间的依恋感中的每一个细微差别,从而触及家宅种种分散的形象之下的统一性和复杂性^{[5]2}。《简·爱》中,窗作为家宅空间的一部分,它见证并陪伴着简·爱经历每一次命运转折。譬如:在红屋子中简·爱最喜欢呆的地方就是波纹红呢窗帘背后的窗台;当简·爱第一次来到桑菲尔德时,眼神所关注的就是透着亮光的窗户;当简·爱离开桑菲尔德,在荒原上无处安身时,目光注视到的仍然是带着亮光的窗。窗,不仅对于简·爱来说是“世界的一角”^{[5]2},对于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倚窗庇护的原初性

简·爱分别在里德太太家和桑菲尔德都有长时间的居住经历,这两所家宅中的某些场所也成为简·爱回归时依然关注的地方。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提出“原初性”概念,从有关家宅的回忆中得出一个“属于内心并且具体的本质”,证明所有受到保护的内心空间形象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是问题的关键^{[5]1},因而,我们应该超越描述家宅的各种面貌及分析它的舒适因素,从而达到原初的特性^{[5]1-2}。透过简·爱两次回归关注的家宅场所,或许我们可以解读出简·爱的精神原初性:

一次是里德太太即将离开人世时,简·爱匆匆赶回。当简·爱回到儿童时期的住宅,依然无法得到两个表姐的认同时,她像儿时一样,选择在窗边坐下,“忙着画一些幻想的小画”^{[6]287}。与之相类似的情景在简·爱到达桑菲尔德之后也发生过,那次是简·爱第一次与罗切斯特的女伴们相见,她有些紧张不安,在房间里等待时,她“坐到一个窗口座位上去,从附近的桌子上拿了一本书,打算阅读”^{[6]207}。窗边是简·爱“曾忍受孤独、享受孤独、渴望孤独、接受孤独的空间”^{[5]9},这样将自己隐蔽起来的状态在简·爱的心中是无法磨灭的。与其说简·爱每次独处的时候都愿意选择窗边独处,不如说这是简·爱在孤独或迷茫时,身体做出的本能选择——于自己建构的空间中寻求安宁,正如一位诗人曾写下这样一句短诗:“我就是我所在的空间。”^{[5]148}在窗边安定的空间里,简·爱找到了自我认同的途径。无论是重回小时候的居住地,还是在紧张不安的陌生环境中,简·爱都在无意识地重复做同样的事,坐到窗边阅读或者写写画画。可见,每当简·爱感到不安与恐惧的时候,她都会选择来到自己认为最有安全感的地方——窗边。窗就是这样一个被简·爱建构起来的独处的空间,在窗边读书是简·爱获得原初体验的途径。简·爱的另一次回归是她从圣约翰家再次回到桑菲尔德。当她刚抵达桑菲尔德时,关注的对象同她第一次来到府上所关注的对象是一样的——窗。当简·爱回到曾经的居住地时,看到窗会在不经意间将自己的思绪和回忆融合在一起,可见,窗是简·爱回忆中的“藏身处”,是简·爱得以回归到记忆中受庇护状态的地方。

对简·爱来说,窗就是她在任何家宅中的可依赖的“世界的一角”,具有原初性。《空间的诗学》中提出“原初性属于每一个人,无论他富有或贫穷,只要他愿意梦想”^{[6]3},具有原初性的家宅空间,即认同感产生的地方,是我们对曾经得到过庇护的家宅的回忆之中能够证明受到保护的内心空间形象。巴什拉继而提出“场所分析”的概念,主张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埋藏在人脑中有关原始居所的无意识,认为在这样的独处空间中,我们往往能达到梦想的层面。对简·爱而言,除了窗本身,窗帘之下的“窗台”亦是她所钟意的藏身之处。儿时的她将波纹红呢窗帘完全拉拢以便与屋内其他人隔绝,玻璃窗既保护她免受外界风雨的侵袭,又不完全将她与外界隔离,让她可以“在翻书页的当儿”偶尔眺望一下冬日午后的景色。窗是可以让她的心灵和身体受到保护

的地方,所以她依赖窗,将其视为心灵的庇护所。如果说窗本身的结构特点让她闲暇时能够享受独处,那么,窗帘之下的窗台则是她面对屋内责备嘲讽的庇护所,在人生的风暴中守护着她。

当窗被作为构建内心空间和借以抒发情感的意象时,窗就被赋予了人性,我国古代诗词中的窗意象就极具人情味。王维的一首“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唱出了多少游子的寂寞与思念,“绮窗”不仅仅是窗,其所象征的家是给予游子安全感的归宿。“一扇窗,不仅仅是与外在世界接触或分隔的界面,它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向内的凝视,投射回我们自身的生活。”^[7]窗见证了人物性格和心理在现实不断冲击下的变化与成长。那么,窗的原初性又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呢?或许与窗的独特设计密不可分,窗最特殊的一点就在于中间与四周不同,人们常以玻璃或其他与四周不同的材质镶嵌其中,这部分可以打开和关闭,在遮风挡雨的同时,不妨碍屋内人知晓屋外的风雨,某种程度上窗促成了屋内人精神的到达,又保持了身体上的距离。窗前还可以挂上一块窗帘作为必要时与外界相通或隔绝的方式:拉开窗帘,这片透明的玻璃便把“窗内”和“窗外”连接起来,使得屋内外透过窗可以相互探看,使得窗具有开放性;拉上窗帘,或者潜伏在开着的窗户后,人物便可以在寒风暴雨来临之际,享受窗及窗下角落所带来的安全感,因而又具备了安全性。对简·爱来说,窗的开放性和安全性生成了窗的原初性,而窗边亦成为简·爱内心世界得以丰富的原初场所。

二、透窗探看的开放性

窗,作为屋内人了解屋外讯息的渠道,起到了通报时间和季节的作用。人们通过对窗外景色的感知来体会昼夜和四季的变化,只要有窗,就可以获得外界的信息。

简·爱被姨妈送到劳渥德慈善学校之前,她曾透过窗向外探看,被玻璃窗外的雪景所吸引。窗户在冬天很容易结上霜花,这让本来可以观察室外的窗户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简·爱哈去窗上的一部分霜花,仔细观察起来:一只饥饿的小知更鸟“停在窗外紧挨着墙长的掉尽叶子的樱桃树枝上啾啾地叫着”^{[6]32}。当屋外寒气逼人的时候,人们总是渴望能够有一处温暖又安心的地方,或是休息,或是“接受它所暗示的休息的梦想”^{[5]40}。可见,寒冷侵袭时,我们往往更加依赖房屋的密封性。然而简·爱却推开了窗,打破了屋内本有的温暖舒适,欣赏起窗外的那只活泼可爱却似乎十分饥饿的小知更鸟。这里“饥饿”和“小”二词值得我们注意。简·爱并不能知道鸟儿啾啾的叫声是否代表需要食物,书中也未写明鸟儿是否吃了简·爱给予的面包碎屑,可是,从哈去窗花到观察窗外景色、再到推窗赏鸟、最后喂鸟这一连串的动作却让读者了解简·爱当时的生存状态。在“饥饿”和“小”字的使用下,我们仿佛更能感受到窗外雪地的空旷与寒冷,这样的背景下,弱小无助的生活状态已不再仅仅是窗外的那只小知更鸟,更是指向窗内同样弱小孤独的简·爱,所以,简·爱同情小知更鸟,因为她与它如此相像——被同伴抛弃,不被周围环境所容,却又是那样的自尊自爱。

史凯契尔德小姐打海伦·彭斯的那晚,简·爱同样向外探看了雪景。这次的雪比上次来得更为猛烈,夏洛蒂·勃朗特写道:“走过窗口,时不时掀起窗帘,望望外边;大雪纷飞,下面的窗格上已经堆起了雪;把耳朵凑在窗上,我能从屋内欢乐的闹声中分辨出屋外大风的声声哀号。”^{[6]63}在窗内外景象反差如此巨大的时候,简·爱像个局外人一样,徘徊于人群与自然之间。同样是雪景,这次窗内外场景的对比甚至更加鲜明,然而,在这次更为激烈的风雪中,简·爱却并没有在姨妈家“窗内喂鸟”的孤独与平静,反而“巴望风号叫的再狂暴一些,昏暗浓到变成漆黑,混乱大到变成喧闹”^{[6]63}。巴什拉援引诗人波德莱尔的诗句论证过这一观点:在家宅遭受寒冬侵袭的时候,人相应也会感受到内心空间价值的增长^{[6]39}。这时的简·爱正寄宿在劳渥德慈善学校中,尽管对学校有种种不满,但是她知道这里有她的一席之地,她在这里是被认可和尊重的,屋外的风雪越大,

她越是能够感受到自己身处御寒的庇护所之中,也越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本该孤独寂寞的时刻反而更加自由,她想象自己与窗外的风雨融合一体,共情自然,实现心灵自由。舒芜指出,窗本身就是通与塞、连与隔、开与闭、明与暗、露与藏、外与内、小空间与大空间的矛盾的统一^[8]。当晚,尽管屋外狂风不断,却丝毫不影响屋内简·爱和海伦·彭斯在温暖的壁炉旁开始她人生第一次与朋友展开关于天堂和地狱的谈心。

屋内人透过窗向外探看时,室外景象不仅为人物提示季节上的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通报时间的作用。作品中多次提到时间,人物都有“拉开窗帘”“放下帘子”等动作,透过窗知晓自己行动的时间。如简·爱等待着第一次与罗切斯特见面时的一段细节描写:“剩下我一个人,我走到窗口去,可是从那儿什么也看不见。暮色和雪片一起使空气变得灰蒙蒙的,把草坪上的灌木都遮住了。我放下帘子,回到炉边。”^{[6]145}透过窗子看到的景象是和简·爱的心理变化密切相关的,罗切斯特的出现打破了简·爱原本平静的生活,茫然无所适从的简·爱向窗外的风景“求助”,寄希望于窗外的环境能明确地启发她,让她心情舒畅起来,可是看到的窗外景象依然是一片迷茫。当透过窗无法判断外界时间和环境时,简·爱唯有“放下帘子,回到炉边”,继续沉浸在无时间概念的漫长等待之中。

窗打通了室内转向室外的渠道,使得屋内人有更好的途径接触到屋外,这种特殊属性无疑使窗具有开放性的意义,这也是窗的魅力所在。在简·爱结婚前的一天夜里,伯莎曾潜进简·爱的房间扯下面纱撕成两半并用力踩踏,临走前,“它拉开窗帘,朝外边看看;也许它看到了黎明来临,因为它拿起蜡烛退到门口去”^{[6]352}。黎明来临,便退了下去,可见伯莎是惧怕黎明的,因为黎明意味着人们渐渐从沉睡中醒来,意味着与人交流的开始;同时,伯莎生活的地方是没有窗户的阁楼,没有窗子也就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但是窗的开放性意义并不仅仅停留于屋内人向外探看的层面,屋外人同样可以透过窗向屋内探视,很多人在阅读《简·爱》的时候可能会忽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罗切斯特表现出来的性格是郁悒粗暴,但他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他曾被一个法国歌女背叛。当时,罗切斯特“把手从开着的落地长窗伸进去,把窗帘拉好,只留下一点空隙……可以通过它来观察;然后关上这扇窗子,留下的一条窄缝只够让情人低声的誓言透露出来”^{[6]177}。如此窥视,使得一扇小窗亦成为屋外人探知屋内秘密的方式,窗帘前即将发生的一切都是未知的,所以,摄人心魂,动人心魄。透过窗,窗外的世界和窗内的秘密都有可能成为被揭示的对象,窗的开放性不仅使得屋外的世界成为屋内人的目光选择,同时也为屋外人提供了连接屋内的通道。

三、受窗护佑的安全性

窗为人们提供探看便利的同时,也为屋内人照亮生活的平淡、驱散生活中的阴霾。如简·爱在里德太太家总是喜爱用波纹红呢窗帘将自己隐藏在窗帘之后的窗台上,通过隔绝屋内压抑的环境、将视线投向窗外的明亮,让心灵寻找希望。《空间的诗学》中,巴什拉曾专门讨论了家宅中的“角落”,角落首先是一个避难所,确保了我们的安全,具有安全性。在小说中“窗帘后”便是这样一个角落,正是安全性使得它成为简·爱每一次想要隐藏自我时寻找的最佳场所。

当罗切斯特携女伴快到桑菲尔德门口时,“阿黛勒飞奔到窗口。我跟着;小心地站在一边,为了让窗帘挡着,我可以看见他们,而不让他们看见”^{[6]202}。“飞奔”和“小心地站在一边”两个动作可以看出阿黛勒和简·爱不同的心理状态。窗可以为室内人提供更为开放的视野,同时也为屋内人提供了最佳的安全角落,窗是阿黛勒和简·爱与外界或者说与罗切斯特取得联系的唯一方式,作者借窗使她们在封闭的生活中看到光亮与希望。

受窗护佑的角落是人们得以潜身的安全区域。阁楼是罗切斯特特意为伯莎“挑选”的藏身

处,阁楼里的环境是这样的:“他从墙上撩起帷幔,露出第二道门;他把它也打开了。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生着火,火的周围用高而结实的围栏围着,天花板上用链条挂着一盏灯。”^{[6]364}这是一个没有窗的阁楼,没有窗就没有自然光,无法分清白天与黑夜。为何作者将伯莎的住处安排在一间没有窗户的阁楼上?巴什拉曾利用地窖和阁楼的双重形象来分析家宅中的恐惧感,他认为阁楼处在明亮的高处,处于理智化投射的理性区域^{[5]21},同时,白天的经验总是能消除夜晚的恐惧^{[5]22},所以,在阁楼上,恐惧感变得更容易“理性化”^{[5]22},理应属于安全区域。可是当我们反观伯莎的处境时,似乎恐惧感并没有更为“理性化”,主要原因就在于伯莎的阁楼没有窗,无窗的环境仿佛是未开化的混沌状态,使生活其中的人缺乏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从而缺失自我认同的安全感,久而久之,生活其中的人愈发感到压抑与烦躁。所以,窗,某种程度上也给予了人物精神上的安全感和身心的自由感。

尽管中西方在窗的设计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如装饰性、实用性等,但是都认为窗所具有的提供光明和希望的功能无形存在于它的功能属性之中。通过窗上的那一层玻璃透射出来的一点点光便足以给予屋外人光明的指引,让他们既能隔着一定距离发现透光的房屋,又能慢慢窥见这一透光房屋的轮廓。当简·爱刚到劳渥德慈善学校时,已经是晚上,天黑有风,此时又饿又累的简·爱首先关注的便是窗户,“有许多窗户,有几扇窗户里有灯光”^{[6]47}。巧合的是,多年以后,当简·爱来到桑菲尔德时,第一眼同样看到了闪着烛光的窗:“有一扇挂着窗帘的凸肚窗里亮着烛光。”^{[6]113}黑暗中桑菲尔德的窗户透出一丝光亮的情景与当时简·爱刚到劳渥德慈善学校时的场景非常相像。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简·爱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会先关注亮着光的窗户,离开桑菲尔德、漂泊在荒野上时也是这样:饥寒交迫的简·爱依稀看到“那友好的亮光从一扇很小的格子窗的菱形玻璃里又照射出来”^{[6]413},于是,她来到了圣约翰家。多次相似的经历透露出作者的用意:在窗户透射出的光亮中,简·爱找到了熟悉的安全感,大胆地探看未知的房屋,也在打探未知的生活。

四、借“窗”栖居的独立性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明,女性只有在经济和空间都独立的情况下才能够培育出坚韧的自尊心和独立意识^[9]。《简·爱》中,窗边就是简·爱孕育女性意识的独特空间。简·爱在窗边独处时阅读了《英国鸟类史》,而正是这次阅读让简·爱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反抗身边压制人性的环境;后来,无论是在劳渥德慈善学校还是在桑菲尔德,简·爱每次做重大决定之前都会站在窗边“把窗子打开,朝外面眺望”^{[7]101}。窗,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从房屋的有形之窗前观看小小的知更鸟,到家庭、学校、生活圈的无形之窗前了解广阔的社会,简·爱认真思考女性独立的命题。所以,她不赞同海伦·彭斯的逆来顺受,拒绝在罗切斯特有妻子的情况下继续留在他的身边,认识到自我价值之后毅然地走出家门,选择勇敢地反抗当时男权社会的家庭伦理。与“窗内”读书的简·爱一样,“窗内”写作的夏洛蒂·勃朗特也在凭“窗”观察、了解、感受“窗外”世界的变化,才有了后来《简·爱》的巨大成功。

那时候的“窗外”世界是什么样的呢?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士发表了《女权拥护论》,“窗内”长期被压制的女性意识爆发出来。这种女性意识与传统女性意识相对,包含性别意识、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10]。从那时起,英国妇女开始组织自己的团体,进行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18世纪女性争取性别平等的声音尽管微弱却很绵长^[11],激励着19世纪身处“窗内”的女性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这些女性作家以独特的写作风格和鲜明的人生态度勇敢地展现现代女性独立自主自强的形象。与此同时,19世纪的英国图书出版业在市场需求、印刷技术、科学文化等推动力的驱使下开启市场化的历史进程^[12],大量书籍涌入市场,吸引女性阅读,

也推动着各个阶层的女性进行文学创作,表达自己对婚姻和社会的独特见解,女性读者与女性作者数量呈现大幅增长。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成功出版,与她凭“窗”观察社会、同时社会局势变动透过“窗”影响着她密不可分。当时的女权运动方兴未艾,但社会对女性作家的包容十分有限。幸而,夏洛蒂·勃朗特的创作地点是哈沃斯,那里神秘的荒原孕育了夏洛蒂·勃朗特从小独立自主自强的性格,让她更容易接受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实现人格独立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哈沃斯远离风起云涌的城市,这种区域特点好似给予夏洛蒂·勃朗特一面隔绝暴风骤雨的窗,让她拥有可以远眺却不必亲临、可以了解舆论种种却不必亲受舆论暴力的创作环境,让她有足够的安全感潜伏在无形的“窗”内,大胆书写女性精神,表达“尊严和爱”的主题。

当时,大环境在改变,但并不乐观。当20岁的夏洛蒂·勃朗特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几首诗寄给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请求后者指点时,后者劝她放弃,在给她的回信中写道:“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女人的事业。”^[13]夏洛蒂·勃朗特将这封回信小心保存起来,却没有因为骚塞的劝告放弃自己的追求,反而更加努力,利用空余时间努力练习写作,最终写成《简·爱》等作品。她的作品,无论是《简·爱》《谢利》还是《维莱特》,都从女性角度出发,呼吁社会给予女性重视与包容。值得一提的是,《简·爱》最初假托男性名“柯勒·贝尔”发表,因为当时的女性作家需要“隐藏”在男性身份之下,才有发表作品的可能;更糟糕的是,《简·爱》初版时被谴责为“粗俗”“淫秽”“有损女德”^[14],直到夏洛蒂·勃朗特的作者身份公之于众时,《简·爱》仍然遭到部分读者的误读。但夏洛蒂·勃朗特对待这些声音却很坦然,仍然继续书写着女性故事,表达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与她身处哈沃斯,所处的小环境与社会大环境保持着距离有关。

除了夏洛蒂·勃朗特之外,她的两姐妹也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女性意识的独特书写方式,三姐妹笔耕不辍,一直都在尝试用文字唤醒女性自尊自强的精神力量。而她们的作品,无论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还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等,都让更多女性意识到经济和人格独立的必要性,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做出了贡献。

窗内家宅,窗外社会。19世纪是英国女性作家步入文坛的关键时刻,“窗内”女性在经历了长期失语和从属状态之后,清楚意识到只有通过主动书写女性自身才有可能被“窗外”世界看见。因此,“窗内”女性作家自我认知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窗外”的时代背景,更离不开女性作家本身强大的女性意识。

窗,在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直到有学者开始关注窗的审美意蕴,人们才开始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它。夏洛蒂·勃朗特写窗的视角是多重的,她将窗作为人物行动前的心理投射,赋予窗人性化意义,使得《简·爱》中的“窗”既具备了事物本来的功能属性,又传达了作品中人物及作者本人内在精神的选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成功出版反映出19世纪女性进入社会的热情空前高涨。尽管当时女性作家还仍需隐藏在男性假名之下才能发声,但是这批女性作家的努力对后来的女性作家和女性作品影响深远,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国家女权运动的快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简·爱》不仅打开了19世纪女性文学之“窗”,甚至成为20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的前奏。

参考文献

- [1] 钱锺书. 钱锺书散文[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13-16.
- [2] 王书艳. 唐诗“窗”意象的空间审美与文化意蕴[J]. 文艺评论,2012(4):50-55.
- [3] 姚琨. “窗”内的悲剧:论《雷雨》中窗户在创作中的作用[J]. 当代戏曲,2020(3):33-36.
- [4] 宋新宇. 《红楼梦》中窗的文学功能研究综述[J]. 红楼梦学刊,2016(4):311-326.

- [5] 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张遗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6] 勃朗特 C. 简·爱[M]. 祝庆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7] 佩里柯利. 窗:50位作家,50种视野[M]. 廖婉如,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5.
- [8] 舒芜. 说梦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79.
- [9] 伍尔芙. 一间自己的屋子[M]. 王还,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58.
- [10] 傅守祥,杨洋. 现代女性意识的文学发动与两种革命:以《傲慢与偏见》《简·爱》为例的审视与反思[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97.
- [11] 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96.
- [12] 于文. 19世纪英国图书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研究[D]. 北京:北京印刷学院,2007:5.
- [13] 盖斯凯尔. 夏洛蒂·勃朗特传[M]. 祝庆英,祝文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8.
- [14] 傅守祥. 恶评打压的《简·爱》与逾矩写作的先锋[J]. 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2):86-90.

On the Imagery of Window in *Jane Eyre*

CHEN Si-yu , FU Shou-x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Window, because of its special attribut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magery in literary works, which has been given a variety of interpretations in the literary context. Charlotte Bronte is especially devo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indow imagery in the novel *Jane Eyre*, which appears frequently and has profound meanings. Based on the theory in Bachelard's *La Poétique de l' Espa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iteral value of the tangible window to the images and plot and the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invisible window to Jane Eyre, Charlotte Bronte and their contemporary women. Window is not only a part of the building, but also the projection of Jane Eyre's spiritual world. The novel shows Jane Eyre's reliable "corner of the world" in the house and the society, which witnesses the changes of Charlotte Bronte, who represents the female writers that spare no efforts in writing about family and society.

Key words: window imagery; female consciousness; women's fiction; *Jane Eyre*; Charlotte Bronte

〔责任编辑:何敏敏〕